

■《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》



郝柏村

筆下的抗戰歲月

中國的近代史是慘不忍睹的，以為在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後會帶來新氣象，但接連的軍閥鬥爭、八年抗戰、國共內戰，硝煙從未熄滅。郝柏村走過中國最動盪的歲月，是蔣介石身邊一位重要的參謀。如今九十四歲的他，以蔣介石留下的日記為線索，每天書寫上千字，最近出版了一部沉甸甸的書——《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》。

他說，不能因為蔣公內戰失敗了，就否定其抗戰的功勞。他也說，抗戰是中華民族最光榮的一戰，年輕人尤其要認識、了解這場戰役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：黃偉邦

郝柏村沒有九十四歲老人常見的樣子，無論站着、坐着，身體都如筆桿一樣挺拔。他有軍人的威嚴肅穆，說話帶着濃濃的地方口音，激動時聲音會稍微大一點。言談間，不難看見他對蔣介石的尊崇，但說到歷史時，他特別理智，不會隨意評斷一個人、一件事，談到一些比較主觀的內容時，他總說「我覺得」、「我個人認為」，而蔣介石在他眼中也並非是完人。他說蔣介石抗戰有功，策略性地帶領中國民眾打了光榮一戰，但內戰時他犯了錯誤。

郝柏村要勾勒的不僅是蔣介石，而是逐漸被人遺忘、卻恰恰影響後來政局、甚至如今兩岸關係的八年抗戰。

重回抗戰現場

時隔六十八年，再論抗戰，彷彿又揭開中國人的瘡疤。今年六月，英國學者(Rana Mitter)出版《China's War with Japan, 1937-1945》一書，重新評價中國抗日對二次大戰的影響。二次大戰的開戰日期各國說法不一，普遍定在1939至1941年期間。然而作者重新分析二戰戰事，認為中國是最早的戰場，而抗戰結果與後來世界的發展及東亞衝突息息相關，正好與郝柏村解讀抗戰歷史得出的結論相互呼應。

郝柏村說，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，抗戰的成果不屬於哪一個黨派，而是全中國人的。1919年出生的他，七七事變時，只是一個軍校學生，抗戰勝利時，他是少校軍官。但對於這段歷史，「我比你們這些只憑書面、照片或影片所看到的印象親切得多。」

執着於抗戰歷史，自有其原因。「中華民族的抗戰歷史是八年，這是世界大戰的一部分，我們的犧牲最慘烈，一般民眾的犧牲不算的話，光是我這一代，當時以二十到三十歲在底下打仗的人最多，我算是年紀小的。1900至1930年出生的人，是抗戰的主流人群，最後差不多有一千萬人犧牲了。」他不無慨嘆地說着這些數字。當時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改革後，衍生了一種相當危險的軍國主義，以奪取東亞領土為目標。

另一邊，孫中山在推翻滿清後，希望建立一個自由、民主、均富的現代化中國，但他手上沒有政權。民國成立十三年，他在廣州黃埔建立軍校，培養軍隊。黃埔軍校成立一年，孫中山去世了，由蔣介石接手，繼續以孫中山提出的「三民主義」而奮鬥。其間，國民黨取得政權，在南京成立政府，雖然仍然面對許多內憂外患的問題，但不能否認，日本眼看中國慢慢走向統一，開始焦急，這也與其渴望中國分裂、割據的期望不符。於是，日本開始發動攻勢，先侵佔東北三省，後攻打上海。

那時各國綏靖主義情緒高漲，沒有人想開戰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也一樣，按郝柏村的話說：「民國二十二到二十五年(1933-1936)這三年間，國民政府表面是團結的，實際上並不是。」他記得很清楚蔣介石當時腹背受敵，既有對中共的五次圍剿，又要平定李宗仁、白崇禧的反蔣行動，後來又發生了西安事變。蔣介石很清楚當時民眾的反日情緒有多高漲，西安事變後，他從西安內後攘外的「和平未至完全絕望，決不輕棄和平；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決策到廬山宣布「最後關頭已經到了」，抗日戰爭正式展開。「民國二十五年(1936年)年底，發生西安事變，最後演變成停止內戰、抗日，當中有太多故事了，」郝柏村幽默地說，這些撼動人心的片刻彷彿不過是昨天的事。

勝利歸功全國

抗戰已經過去六十八年，郝柏村依然記得很清楚，每一個細節、蔣介石的每個決定都說得有條不紊，因為「我參加過抗戰、參加過內戰，我身歷其境，我看到這些字(蔣公日記)，等於又重回了抗戰的歲月。」蔣介石之於他，是領導、是朋友，也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物，因而提到他時，他總有不同的說法。有時會嚴正地稱他「蔣委員長」，說到一些瑣碎的事情時，「老蔣老蔣」地不自覺就冒出來，說到激動處就直喊他「蔣介石」。

「我在蔣公身邊五六年，他的日常生活我都可以對照，我想這不是其他人所能感受到的。」有段時間，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非常親密。「沒有蔣委員長的堅定意志，中華民族的精神不能發揚出來。」這是他對抗戰中蔣介石表現的肯定，也是撰寫本書的初衷。兩岸三地，因為不同的文化與背景，所接觸的歷史資料也不盡一樣，郝柏村不諱言，這六、七十年來，關於抗戰和內戰的真相是不完整的。

郝柏村強調：「我不是自己在寫歷史，我不是寫內戰史、寫抗戰史，我只是根據他(蔣介石)的日記而寫，裡面有關於抗戰、內戰的重要決策，我想這些重要的決策都是他自己決定的，他日記上寫得很明確。」可以這麼說，郝柏村是以國民政府面對抗戰為視角，以蔣介石的決策為基石，詳細寫出普遍歷史書未必涵蓋的部分真相。在他心中，這光榮一戰改變了中國的命運，因為中國得以取消所有不平等條約，收回了失土，這對中華民族、對世界而言都有其意義。

「抗戰的成果是全中國的。」他一再強調。

■《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》



兩岸關係由歷史決定

抗戰遺留下很多火苗，最直接的問題、也是大家關心的，便是兩岸的關係。兩岸關係幾十年來，剪不斷理還亂。對此，郝柏村忍不住提到他參與的最後一役——金門炮戰(又稱八二三炮戰)。1958年8月23日，中共首先發動攻勢，其後台灣也開始反攻。一個多月的戰事，雙方炮彈你來我往，最後台灣守住金門，此後，兩岸再沒有大規模戰事。郝柏村根據這次事件，形容兩岸關係是「國際因素的內戰問題」。「廈門打台灣金門的是中國人，對不對？我們金門炮打廈門的也是中國人，這是中國人打中國人。可是用的炮，內地用蘇聯的炮打金門，金門用美國的炮打廈門，這不是國際因素嗎？我一直認為兩岸關係帶有國際因素，但也是一個內戰問題。」

他對於兩岸未來的走向，抱持一種相對「老派」的價值觀。是建基於歷史而提出的看法，就是「一個中國原則」。長始以來，「一個中國」各有各的說法，有人說是「兩個中國」，有人說是「一中一台」的兩岸關係，但1972年中美兩國在上海簽署《聯合公報》後(又稱《上海公報》)，具體的定案便落實了。一個中國的原則基本的論調便是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，沒有所謂的「兩個中國」或「一中一台」的說法。

雖然，郝柏村言談間對於當年中美私下簽署、台灣並沒有參與略有不滿，但他也認同這個說法，因為「老蔣本來的持

就是一個中國原則。」「但甚麼是一個中國，要兩岸來談，事前要先把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問題解決，所以1992年台灣和內地都派人到香港談，我們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，內地說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這談不攏啊！」最後雙方妥協，口頭上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關乎兩岸的，但一個中國的內涵就各說各話，這就是「九二共識」的淵源。

但有些台灣民眾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，也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，甚至否定「九二共識」，對此，郝柏村有點無奈，他直言：「我們沒有這個權利來反對，但是我們看見世界歷史有一個主流方向，任何一個政府政黨都必須符合那個方向在走，違背這個主流，最後都會失敗的。」

「求同存異，和平發展」是世界主流，也是兩岸人民認同的方案。「歷史的潮流只有一個，不會有兩條路，這是我們普遍同意的，也是六十年來我對兩岸關係的想法。」

他補充：「我想孫中山的方向，還是我們全中國人應該走的路。」孫中山的思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，毛澤東的思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，而蔣介石的思想也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大一統中國，大家的基本思想沒有分別，「但操作上卻不一樣」。

郝柏村相信，一切在歷史裡都可以找到答案。



尊重歷史 謹言慎行

郝柏村很慎言，不怎麼談論國共問題，也不評價馬英九「政府」的功過，對於兒子郝龍斌是否參與下一屆「總統」競選，也三緘其口。

「我講的是最真的！」談到歷史真假問題時，他擲地有聲地拋出這一句，也是他整個訪問中最鏗鏘有力的一句，話沒說完，他接着說：「這是根據他(蔣公)的日記所寫的，他的日記當然是主觀的，也不是百分百正確的，但所記的事件、下的決策是真的，否則他不必記下來。」書中

詳細列出蔣公每天所記的事，包括對戰爭的想法、決定。

有句話他經常掛在嘴邊：「蔣公到台灣不是逃



難，不是偏安，是不放棄絕望中的奮鬥。」金門炮戰後，內地發生三反、五反、文革等事件，很多人說，台灣為甚麼不趁機反攻，反攻一定可以成功。「我們是準備反攻的，但我們和美國簽了《美台共同防禦條約》，裡面規定中華民國不能對內地採取任何行動。」郝柏村言及此，頗有感觸。